

## 论译者主体性之构成

冯文坤,何颖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成都 610054)

**摘要:** 由“它是”(作者、原文)到“我是”(译者、读者)的转换,译者主体性不再是依附性的,而是以“我是”为缘起之主体构成,是多元合一的互动与被动的统一。本文拟在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的相关话语下指出:译者之主体性只能是构成性的,是不断生成与“延异”着的。

**关键词:** 翻译;译者主体性;多元互动;构成

哲学界对经典符合论的质疑与对二元对立模式之消解,从而释放出了自我,注意到了“此在”之缘起,成就了从“它是”到“我是”之转换。<sup>[1](P5)</sup>但“我是”不是我之孤起,而是我与历史、环境、群体意识的圆舞共存。《云笈七签》中言:“我命我在,不在天地”。<sup>[2]</sup>虽然悬置了天与地,但“我命我在”之“我在”却依然要在实践的层面上与设置了自身的诸要素打交道。可以说,“我在”在出发点上是主动的,但在实践上却是被动的。今天译论界对于翻译主体性之讨论,对于确立译者被遮蔽的角色,转换研究视野,开启了新的视野。本文认为,由“它是”(作者、原文)到“我是”(译者、读者)的转换,译者主体性不再是依附性的,而是以“我是”为缘起之主体构成,是多元合一的互动与被动的统一。本文拟在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的相关话语下来予以阐述。

在传统译论中,译者之角色与地位历来是在依附性与被动性的话语谱系中得以定位的。如“译者,舌人也”、“翻译者,叛逆者”、“译者是职业媒婆”、“译者是语词的摆渡人”、“译者是一块透明的玻璃”、“译者是高明的摄影师”。<sup>[3](P77)</sup>这些以“作者中心论”与“原著中心论”为出发点的话语谱系,充分反映了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边缘化地位,至少在客观上遮蔽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实际地位。这一话语谱系在深层次上则是古典思维模式中的“符合论”——原本与影像、在场与不在场——在译论上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西方认识论中对二元论的解构,哲学上由“它是”向“我是”转向中对“此在”之境域构成的关注,翻译研究也由传统的语际转换、由原文到达译文的线性研究递变为“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

收稿日期:2004-06-20

作者简介:冯文坤(1963-),男,四川阆中人,上海师范大学校友,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诗学、英美文学、翻译学研究。

何颖(1967-),女,四川南充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翻译学、劳伦斯专论研究。

越”。<sup>[3](P75)</sup>其中,关注并引入主体性概念在翻译过程的作用,就是这种递变中最明显的一维。如有论者针对译者在翻译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模糊身份”,主张确立译者主体性对于译者、译文、译语文学重新定位;<sup>[4](P20~21)</sup>有的针对译者主体性之多元决定论对翻译中的“误读”、“偏离”、“延异”以及“创造性叛逆”给予了肯定性的解释;<sup>[5](P8~14)</sup>有的则由译者与原文之间是一种互文性关系,独立的译者主体性是“时隐时现”,而多元的、交互的主体性在翻译占上风,翻译过程中主体性构成于“赞助人”、“知识权威”、“文化认同”、“意义延异”等制约,因此译者主体性往往受到弱化、削减,所以,译者主体性是一个综合的合一。<sup>[6](P39~43)</sup>

总体而言,上述对翻译主体性的讨论,其理论资源皆植根于西方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理论。现代阐释学主张任何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既是历史的载体,也是通往未来之桥梁,因此主体是一个综合体,是历史、个人与时代境域的合一。<sup>[7](P307~319)</sup>人与世界的融合,既把自己整合进世界之中,同时世界也通过自我彰显。此融合中,个人既克服作为对象之“异己性”,又同时在对象之照亮下扬弃自身之主观性与任意性。阐释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否定了接受主体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坚持在人类文化中能动的‘自我’(ego)这个绝对的精神主体的创造性”,坚持以自身体验在对象感悟中,在“你”之中重新发现“我”。<sup>[3](P76)</sup>理解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不再是单一主体的独白,而是以我之此在“在场”的方式与对象形成对话关系。

以此关照翻译之主体性,其重心似乎必然落实在了译者身上。目前国内译界对于翻译主体性在重新认识翻译之意义与译者之作用上取得了普遍的认同,但对翻译主体性之本质与界定存在着分歧。大致讲,主要有两种看法:一为广义的主体性;一为狭义的主体性。前者认为,翻译是一个系统论,涉及到作者、原著、原语文化与译者、译著、译语文化、读者之间的互动交织,共同构成翻译过程中诸要素,由于译者是这个互动交织活动中的一元,而且是能动的一元,其他诸要素都是构成译者身份并被译者所对象化。<sup>[4](P21)</sup>后者认为,翻译中的主体应指译者,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

造意识。”<sup>[8](P9)</sup>其认识论上的基点是认为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客观对象(物)是主体之物化、对象化,主体在使自身对象化时,同时也遮蔽了作为对象的主体性,因此它强调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sup>[9]</sup>但是建立于“理性是自身展开的”传统主体观,虽然对翻译中遮蔽译者主体性的认识有所颠覆,但却容易把译者从翻译网络中疏立出来,从而成为孤立的主体,即使它为我们解释翻译中“误读”、“创造性叛逆”等提供了认识论上的支持,却不利于对翻译研究进行整体把握。

以上关于确立翻译主体性的议论对于矫正翻译研究中译者之边缘地位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仍需要对翻译主体性之构成以及译者在翻译中之实际功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弄清楚翻译研究由“它在”到“我在”的转换中所具有的真正意义。

## 二

译者从对象那里获得界定。任何界定都必须把被界定者置于其关系之中,置于其对象化的客体中。被界定者也只有在与之发生关系的诸对象那里获得自身的身份与价值。孤立的主体或对象是不存在的,一切主体都是在对象那里获得其自身规定性的。即使就个体的主体而言,只要我说出,那么,这个被说出的主体,就已经被当作对象或对象化了。“如果再对这个被说出的主体加以规定、分析,则是将其进一步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过程,虽然是在说主体,但是,这种被论说的主体,与原本的主体,不仅不同,而且不同的程度,随着对象化的加深,也越来越大。就是说,对象化不是回归和接近原本的主体,而是离开主体和越来越疏远主体。”<sup>[10](P5)</sup>同样,译者正是相对于其所要理解的原文、其所要记录的再次书写。译者在决定自己翻译目的、具体文本、处理策略时无疑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也即是实现了自己主体意识的对象化。但是当主体意识作用于原著这个客体时,其主体意识必然要受到原著的限制与制约。

具体地讲,译者在直视对象(原著)时,他是以一种群体意识的综合体滑入对象的,而并非单一“净化”的主体。这一群体意识是由译入语、译入

语文化、读者期待视野所构成。也就是说,译者在将视野滑入对象时就已经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一种“视野融合”后的过滤处理。谢天振在《译介学》一书中指出:“通常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仅仅是译者,其实不然,除了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主观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sup>[11](P13-14)</sup>其中“接受环境”也就是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所说的“主观事件”,即“理解活动就其本性而言是超主观的事件,是一种历史意识”。<sup>[12](P19)</sup>伽达默尔的历史性视野暗示,译者对原著之理解以及原著对译者所呈现的意义,是受制于译者的特定历史阶段性的,其必然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必须充分认识到意义在时间和可变情境中的可变性。正如现代阐释学家霍恩所说的:“创造性需要与过去决裂,需要与过去所加于艺术自发性之上的束缚决裂。其困难是,人作为反省的存在是不可能简单地回到一种单纯直线状态中去的。”<sup>[13](P171)</sup>“人作为反省的存在”也就是伽达默尔的“历史意识”,指人认识的限度,也是人在认识之途中所携带的“包袱”。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是潜在的,其主体之有效性只有在面对原著时才能被激活。因此可以认为:“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sup>[14](P291)</sup>需要说明的是,“否定自身”不是“掏空”和“净化”自身,而是在面对原著——原著“异己性”语言、文本结构图式、文化隔膜、审美特质(“诗学标准”)——压力下对自身的调适与弱化,甚至对自身实施“隐没”,以便与原著达成默契。

可见,译者之主体性既受到自身文化处境的辖制又受到源语文化语境中原著的规约,因此译者是个共在的主体。我同意许钧的“一种共在的自我”的提法:“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为存在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sup>[15](P291)</sup>译者之主体性也就只有在其对象中予以界定了。

### 三

译者主体既受到译入语诸环境的制约又受到译出语的规范,似乎译者就只是充当了桥梁的作用,其“唯我性”化为虚无。而今天“文化转向”下

的翻译研究由“它在”移位到“我在”,更多地关注译文产生的多元条件,也即是关注于“我在”自身的受约机制。从整体上看,“文化转向”也就是将单元的译者视野,转换成为含译者在内的译入语如何面对原著时所实施的“再现”、“重写”与“误读”。在这一转向中,个人主体(译者)只能是被构成性的,我们把“它”作为主体看待,绝不是把“它”如在黑格尔那里被视为“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创造,是寂寞的思想家的内心独白”,<sup>[16](P127)</sup>而是“它”在面对对象时成为其主体性,而对象(原著)又在其关照之下生产着对象(人、主体)与自身(主体化的)。故此,福柯说过:“语言并非扎根于物,而是扎根于主体的行动。”扎根于物,语言在场性被遮蔽,被定格,而扎根于行动,则会在运动中不断开放着,“延异”着,“播撒”着。王船山说:“以实言之,彻乎古今,通乎死生,惯乎有无,亦恶乎有所谓先后者哉?无先后者天也,先后者人之识力所据也。在我为先者,在物为后;在今日为后者,在它日为先。”<sup>[17]</sup>原语的含义正是在译者主体的行动中绽放,在“先在”、“它在”(原著)与“我在”(译者)之遇合中互动与交织。此即庄子之“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齐物论》)译者与原著之间是一种我与它、主体与客体、“我在”与“它在”的关系,介入或滑入对方是对自己的毁损,却是成就对象。而以主体滑入对象时亦同时让对象滑入自我,在对话中取得“视野融合”,则是化解“成”与“毁”,实现“道通为一”。

关于主体与认识对象之关系,马克思亦曾作过精辟的阐释:“当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对象创立出来时,这种创立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那它就不能对象地活动。”<sup>[18](P120)</sup>伽达默尔更是明确地指出:在“自身置入”时,“不只是丢去自己”,同时,“我们必须也把自己一起带到这个其他的处境中”,这样的“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

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sup>[19](P391)</sup>如果说马克思旨在指出主体与客体彼此激活对方——主体在行动中使对象主体化、对象也使主体客体化,那么,伽达默尔所说的“更高的普遍性”事实上就是主体与对象相遇后所滋生的“大视域”。

同理,译者与原著之间的相遇,原著在译者之介入中激活自身的结构图式的同时,译者也在自身开放性图式中吸纳了对方。从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看,原作进入译入语中,除外在语言形态上异化为译入语形式外,更因上文说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而打上了译入语文化的烙印,负载着译入语时代文化的意蕴,译作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它既与原作有着某种联系,是原作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里”的生命延续和衍生,又是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价值的“后起的生命”。可见,译者和原作者都是翻译的主体,他们共同完成了翻译的任务。因此,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就不应是主次/主仆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既然是对话关系,翻译就不是某一方垄断了话语权的独白,也不是译者对原作者的“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般的机械应和,而是双方都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译本就隐含了一种“复调结构”。

#### 四

以上我们从主体与主体之间互为对象的认识论角度,讨论了译者与原著之间互为对象的主体关系,也就是主体间性关系。我们也因此不赞成将译者主体从翻译主体中类分出来,从而成为翻译研究中的双重主体。我们也不赞成译者之主体性表现于克服困难时所体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在面对原著时要“抹去自己”、泯灭先结构的“掏空”自己,“或者过分拘泥于本民族的特色而损害原文,或者过分忠实于原文而生吞活剥”<sup>[20]</sup>的“忠实”与“归化”二元极端。主体只能是构成性的:对于译论家而言,是由翻译的话语谱系、思维范式的选择等因素构成的,对于译者而言,则是在翻译行为的运动之中构成的。因此可以说,译者

主体性就是译者使认识对象(原著)、认识过程(交互主体)和认识结果(译文)渗透、凝结着主体因素那样一种特性。<sup>[21](P20)</sup>译者与原著并透过原著与原语文化打交道,译者也同时在译入语“诗学标准”下与译入语、与译入语文化、与读者之审美期待打交道。此种交道之胶着互动最终凝结成“契合”、“和谐”或“译文”。正如胡塞尔指出的:“我就是在我自身内,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意识生活中,与其他人一道,在可以说不是我个人综合构成的,而是对我来说陌生的、交互主体经验的意义上来经验这个世界的。”<sup>[22](P878)</sup>既非个人的,亦非陌生的,既非“异化”,亦非“归化”,既非先验的理性自身运动,亦非个人主观的任意性,而是在行动中的“群体化”参与和“和实相生”的主体间性。

译学研究由“它在”到“我在”,由“单子主体”决定客体对象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共在主体”转换,既改变重新认识译者之定位的学理基点,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转向”中的译者之构成。“文化转向”在将翻译研究从原文到译文的语言学直线视野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译者置入了系统论的决定论与受动性之中。重视主体之构成性的拉康更是通过对主体的消解来重构主体的。拉康认为:主体并不能对自己有明确的把握,是一种说不出也说不清的存在状态,掉在语言的陷阱里,自己对自己说了什么不是很清楚。当主体对客体对象说话时,由于语言中介作用的干预,使得主体扭曲变形,永远无法抵达他者。“我总是想与真正的主体讲话,但我不得不满足于影子。言语活动之墙把主体与他者的真正的主体隔开。”<sup>[23](P286)</sup>在拉康看来,个体在借助于他者构筑自我形象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形象的背离和异化。一方面对自我形象有一定的感知和认识,一方面却是作为自我形象的不在场。那么,拉康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如何可能呢?那就是主体间性。方生解释道:“‘我’是通过‘他者’来建构的,……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因为‘他者’并且通过‘他者’,才使得‘我’成为对‘他者’说话的‘我’,‘他者’成为听‘我’说话的‘他者’”<sup>[24](P49)</sup>

同样,“译者”在滑入原著之前,其主体性是“虚以待物”的,是处在想象阶段的。“译者”只有在滑入原著之中,其主体性才得以形塑。“译者”

自身语境、文化结构、文学维度以及读者“期待视野”才开始由隐至显,并在与对象的遇合中遭致“扭曲变形”,从而形成“异化”,乃至最终取得由显致隐的退化形式。但这种退化形式是双向的,是我(译者)与他者(原著)取得同一或自我同一的必要形式。它向我们展示了译者之“我”如何发端于原著的主体性的,又展示了译文之创生又是如何停留在对读者接受的预期上的。可见,在翻译活动中、译文与译文的接受过程中,所谓“独立的主体性是时隐时现的,但多元的、交叉的主体性占上风”,<sup>[7](P7)</sup>译者之主体性只能是构成性的,是不断生成与“延异”着的。

#### 参考文献:

- [1] 萧诗美.从“它是”到“我是”:西方哲学主体性转向的内在逻辑[J].江海学刊,2002,(4).
- [2] 道藏(22册)[M].
- [3] 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
- [4]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 [5] 图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
- [6] 杨柳.交互主体性 VS 主体性:全球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9).
- [7]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8]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 [9] 王玉琛.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1996,(6).
- [10] 王树人.关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思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2).
- [11] 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
- [12]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13] D. C. 霍埃.批评的循环[M].兰金仁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14] 杨达恒.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A].载谢天振编.翻译的理论与文化观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15] 许钧.翻译主体间性与世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7).
- [16]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7] 王船山.周易外传[M].
- [1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王坤译本.
- [1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3.
- [20]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21] 贺建立.如何理解认识的主体性[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1).
- [22] 胡塞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 [23] Jacques Lacan, *Le moi dans la the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ichanalyse*, Paris, Seuil, 1978.
- [24] 方生.后结构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 Beauty Can't Manifest by Itself & It is Made Visible By Man's Participation; On the Constructivenes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ENG Wenkun, HE Y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Now in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more and more discussion is devoted to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enlightening the vision of re-understanding the obscured role of translators and establishing a new approach towards translation study. This paper holds that ow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 is” to “I am”, the translator's role is no more derivative, but it is rather constructive, hence a unity of interactive factors. The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 and inter-textuality, points out tha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is being constructed, being constantly generative and perpetually deferr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multi-interaction, constructiveness

(责任编辑:吴晓明)